

唐宋词流派研究

余传棚 著

丛书主编 陈文新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文库



全国优秀出版社
武汉大学出版社

【总策划 陈广胜】

责任编辑 陶世瑞 责任校对 黄瑞生 版式设计 支蕾 装帧设计 汪卉

ISBN 7-307-04163-4



9 787307 041639 >

定价: 12.00元

ISBN 7-307-04163-4 / I · 277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文库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陈文新

唐宋词流派研究

余传棚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词流派研究/余传棚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6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陈文新主编
ISBN 7-307-04163-4

I. 唐… II. 余… III. ①词(文学)—文学流派—研究—中国—唐代 ②宋词—文学流派—研究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4388 号

责任编辑: 陶佳璐 责任校对: 黄添生 版式设计: 支 笛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whu.edu.cn)

印刷: 湖北省黄冈日报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75 字数: 166 千字 插页: 4

版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307-04163-4/I·277 定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买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者,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张清明 胡德坤

主 任 陈广胜

副 主 任 陈文新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秀英 王法敏 尹 富 孙玉明

孙东临 刘少安 刘玉湘 刘良明

刘保昌 乔惟德 严 红 余传棚

余来明 宋玲玲 李建平 陈广胜

陈文新 陈顺智 张蕊青 柯 青

段 超 陶佳珞 陶洪蕴 夏武全

谢 湘 雷喜梅 熊礼汇 薛 勤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

总 序

出版一套卓有建树的丛书，这是每个丛书主编的愿望。这一愿望是否能够实现，我以为，取决于对三个层面关系的处理，即在社会需要、圈内交流和学者个人兴趣之间，能否取得协调和互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积累了一些体会，愿借此机会求教于学界前辈和各位同仁。

任何学术活动都不可能脱离社会需要而存在。不被社会需要所认可的学术活动，一方面是社会意义的丧失，另一方面是自身发展活力的丧失。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说，衡量一种学术研究的价值，其标准之一是它对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明确了这一点，再来讨论社会需要的不同种类，对不同学科的定位就会更加合理一些。比如，经济学参与国家的经济建设，法学参与国家的法制建设，现实生活对这一类学科的需要是一般人也能理解的。一般人所忽略或未能充分理解的是现实生活对古代史、古代哲学和古代文学这一类学科的需求程度。造成这种忽略或理解之不充分的主要原因是对社会需要的理解过于简单、肤浅和狭隘。社会需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应用型的需要。在一个科技进步、商业繁荣的时代，高度的工业化和商业化所引发的道德危机、心理危机，不仅会造成诸多人格的病态发展，而且会造成社会各方面利益的剧烈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读一点《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读一点《史记》、《汉书》，读一点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涵泳古代的人文智慧，不仅可以充实我们

的心灵，陶冶我们的性情，丰富我们的人生，对于正确处理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无疑也是有裨益的。这是一种显层次的需要，当然值得重视；另一种需要是隐层次的，非应用型的，在我看来更值得重视。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其历史还不长，西方走在前面，中国走在后面。一个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其是否兴旺发达取决于凝聚力的强弱。而所谓凝聚力，是以现代民族文化为其核心的。在建设现代民族文化的过程中，重新体验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创造性地加以阐释，使之成为现代民族文化的重要精神资源，这是21世纪的重大课题，是足以让古代文学研究者感到自豪和任重道远的课题。《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即旨在满足这一层次的社会需要，旨在为现代民族文化添砖加瓦。这一愿望尽管有些奢侈，却是促使我们潜心于学术的基本动力。

学术研究的基本特征是其学术性。没有学术性，就不能算是学术研究。从这个角度看，所有学科，不仅是人文学科，都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象牙塔里的学问，它首先必须在专家圈内流通。同行专家对一项学术成果的认可，并不取决于它对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而更看重下述两个方面：其一，这一成果是否严守学术规范；其二，这一成果是否为学科专业提供了新的内容。符合这两个标准，它就是好的成果；不符合这两个标准，就不是好的成果，甚至不是成果。以学术性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是努力以创新为目标，并严守学术规范的。1998年10月，我们以这一课题申报首批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在申报表中，我们指出：

“1. 流派研究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就个案研究而言，与流派相关的研究成果，不乏举足轻重之作，如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蒋寅大历诗派研究、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等。但应该指出，这些学者的宗旨主

要不是为了总结流派理论，而是系统钩稽与作者经历、作品版本、情节本事相关的资料，对作品的思想倾向和艺术得失作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所以，尽管这些成果分量厚重，但从总结流派理论的角度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此外，学术界花较多精力认真考察过的流派，其涵盖面尚嫌狭窄，还存在着广阔的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我们选择《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作为课题，旨在以作家作品研究为基础而又超越作家作品研究，尽可能全面地观照中国古代文学流派，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系统性和理论深度方面取得进展，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成长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2.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流派众多，其形成过程和命名方式不尽相同。或以朝代年号命名，或以作家姓名命名，或以地域命名，或以社团命名，或以风格命名，或以总集命名，或以题材命名，或以社会阶层命名，或以理论主张命名。《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的课题设计，尊重约定俗成的用法，不强求命名方式的统一性，但仍有相对一致的衡估标准。其基本思路是：从总体上论述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的对象、特征、意义及其他相关问题；选择中国文学史上影响较大而学术界又研究较少或我们认为还有必要继续研究的文学流派作为系统研究的对象，如诗中的玄言诗派、官体诗派、格调派、神韵派，词中的浙西派、阳羡派、常州派，散文中的台阁派、秦汉派、唐宋派、桐城派、湘乡派，小说中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人情小说等^①，从流派的形成、发展和特征入手，考察流派与思潮、流派与地域、流

① 本课题不拟研究中国古代的戏曲流派，如元代杂剧中的文采派、本色派，明清传奇中的吴江派、临川派、昆山派、苏州派等，其原因在于，戏曲流派并非纯粹的文学流派，它同时也是或基本上也是艺术流派。对戏曲流派的研究，不仅涉及到文学世界，而且涉及到艺术世界（如表演体系等）。鉴于这一事实，本课题涵盖的文体包括诗、文、词、小说，不包括戏曲。

派与社团、流派与题材等关系，对其文化含蕴和审美祈向作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我们认为，尽管‘严格意义上的流派成熟于明代’的说法不无道理，但约定俗成意义上的流派则是伴随着文学的独立而出现的。约定俗成并非清晰的理论界定，但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元素，它在本质上是合乎逻辑的，具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性、规律性。我们的目的就是充分揭示其蕴含，发现流派演变中许多问题的关键，总结和发展体系化、规范化的流派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深化对相关作家作品的认识。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有选择地引进西方理论，以提高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不能削足适履，生搬硬套；既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考察，又不局限于作家作品考察；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有机结合，融会贯通，以期取得重大学术成果。”

上述断言和设想，正如我在《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一书的《结束语》中所说，“还需稍加补充说明”，并不完全妥当。但我们对创新性的重视和追求，毫无疑问已明白表达出来，并在整个研究和撰稿过程中，成为我们基本的原则之一。对于学术规范的恪守，也是丛书各位作者的共同信念。

学术研究经常是一种个体劳动。个体劳动的方式容易导致以个人兴趣为中心。也就是说，某一学者在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式和研究课题时，既不是从社会需要出发，也不是从专家圈内的交流出发，其立足点是自身的兴趣和爱好。这一类型的研究经常受到非议，因为学术研究的私人化可能导致学术自闭症。正是鉴于这一可能的弊端，程千帆先生多次强调，即使是研究古代的学术，也要关心现实社会和当代文化，要“预流”。这一告诫无疑是中肯的。但问题不必绝对化。“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人类的心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一个学者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做研究，其终点也许恰好与圈内交流和社会需要相衔接。所以程千帆先生又说：“学术研究如陈寅老说要预流，这只是一方面，也有

通过自己的专业，对于新兴的学科有所贡献者。如潘重规先生，他是季刚先生音韵、训诂学的传人，但他接触敦煌学，发现敦煌的俗字非错字，就是对于敦煌学的贡献。”（见蒋寅、巩本栋、张伯伟《书绅录》）学术研究的个体性不一定与社会需要和圈内交流相矛盾。我们这套丛书的选题设计也可以证明这一立论。比如，熊礼汇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散文研究，已出版《先唐散文艺术论》等获得学界好评的专著，《明清散文流派研究》是他个人科研计划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陈顺智教授于1994年出版《魏晋玄学与六朝文学》，《东晋玄言诗派研究》是与之衔接的后续成果；刘良明教授于1991年出版《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晚清小说理论流派研究》是其前期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孙东临（石观海）教授的官体诗派研究、乔惟德教授的神韵派研究、余传棚教授的唐宋词流派研究和我的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也都是各自长期关注的领域。所以，尽管《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从立项的时间看只进行了不到五年，但因为前期积累较多，自信不属于急就章一类。这是我们感到颇为欣慰的。在诸多丛书中，我们这套丛书既是一个相互之间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又充分尊重各位学者的个人兴趣，应该算是一个特点。

《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是《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的导论，由我执笔，原拟附在丛书各册之前，因篇幅较长，改为单独印行。1993年我曾出版《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一书，可以说，流派研究很早便进入了我的学术视野。但系统地思考和阐释中国古代的流派理论并以此为基点考察种种流派问题，却是1998年以来的事。限于学力，一定会有种种缺憾，恳请读者和方家指正。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项目的研究工作得到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部、武汉大学人文学院、武汉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部

门和诸多师友的支持和帮助，熊礼汇、孙东临、陈顺智、乔惟德、刘良明、余传棚等先生为丛书的撰写付出了辛勤劳动，谨在此致以由衷的感谢！在项目成果的发表过程中，我们先后得到《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学术研究》、《文学评论丛刊》、《红楼梦学刊》、《社会科学辑刊》、《社会科学战线》、《山东社会科学》、《江汉论坛》、《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求是学刊》、《学术论坛》、《明清小说研究》、《齐鲁学刊》、《东方丛刊》、《贵州社会科学》、《中南民族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人文论丛》、《南昌大学学报》、《杭州师院学报》、《贵州文史丛刊》、《蒲松龄研究》、《三峡大学学报》、《忻州师院学报》、《洛阳师院学报》、《孝感学院学报》、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刊物的支持和帮助，亦一并致谢！

陈文新

2003年2月8日于武汉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前流派词索隐(代绪言)	1
一、敦煌民间词的逻辑指向	2
二、隋唐文人词的历史走向	11
第二章 花间词派评辨	21
一、花间词派不宜又名西蜀词派	21
二、花间词派的创作纲领见于《花间集序》	23
三、花间词派的主导风格是柔靡绮丽	27
四、花间词派创立“艳科”传统功大于过	30
第三章 南唐词派定位	34
一、南唐词派与花间词派同源异流	35
二、南唐词派的主导风格是哀婉凄丽	41
三、南唐词派直接开启婉约词派	48
第四章 婉约词派究真	53
一、婉约词派之时空界定不宜过泛	53
二、婉约词派主导风格是清切婉丽	60
三、婉约词派之功过是非评判宜允	75
第五章 颓放词派探微	80
一、颓放词派的客观存在不容忽视	81

二、颓放词派的主导风格是颓靡放逸·····	85
三、颓放词派有过有功,功大于过·····	100
第六章 豪放词派质实 ·····	105
一、豪放词派为抗争颓放词派而兴·····	106
二、豪放词派风格由苏辛主导·····	110
三、豪放词派分苏、辛二派·····	123
第七章 雅正词派正名 ·····	144
一、雅正词派名从何来·····	144
二、雅正词派得失何在·····	168
三、雅正词派亦能分派·····	183
第八章 唐宋词派鸟瞰(代结语) ·····	191
主要参考书目 ·····	198
后记 ·····	202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总跋 ·····	203

第一章 前流派词索隐（代绪言）

中国古代素重“诗教”。诗、乐相关，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诗教”以是又称“乐教”。诗系合乐之诗，乐乃奏诗之乐，有诗则有乐，有乐必有诗。诗、乐并兴，自先秦迄隋唐，无代不有。先秦盛占乐，其诗有“三百篇”；汉魏六朝行清乐，其诗称“乐府”；隋唐之际兴燕乐，其诗为“曲子词”，亦称“词”。词随燕乐而兴，生于隋唐之际，发展于盛、中唐之间，繁荣于晚唐、五代，大盛于宋。词继诗而后兴，作为新型诗歌样式，其兴生、发展一如既往之诗，先缘起于民间，后成长于文人之手。及趋繁荣，始生流派，于晚唐、五代之际生出第一大文人词派——花间派。至臻大盛，流派更纷生出，或先后交争，或一时并竞，终成一代之胜。词自初兴至生出流派，越隋跨唐，历时凡二代近三百年。二代近三百年间词作不辍，既有20世纪初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据考为此间所作数量可观之民间曲子词，亦有见于载籍，据载为此期文人所作数量更巨之诗客曲子词。这二代近三百年间由两大类创作主体于词派生出之前所创作之词——敦煌民间词和隋唐文人词，可称为前流派词。前流派词于唐宋词流派研究关系甚巨，因为：一、前流派词之于流派词，无论于理于实，皆系不可或缺之必要先导与铺垫。任何事物皆有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隐而显、由微而著之必然发展过程，论事议物，所忌在只知其有，不知其无，无视其隐微，只究其显著。烛微知著，始称有识；由显索隐，方见深

心。二、自花间词派摘艳藻道艳情，创立所谓“艳科”传统，论词者将词与诗比较之余，多谓“诗庄词媚”，“词为艳科”，以“媚”、“艳”定词之品性。有关其功过是非之论，无论褒贬毁誉，亦多集矢于花间一派。而一旦论及前流派词，必多曲加维护，断然论定其与“媚”、“艳”绝无牵连。即使有论家偶论及其时或一见之“媚”语“艳”情，亦多点到为止，轻忽带过。似乎所谓“艳科”传统乃平地惊雷，突兀而出，无源有流、源短流长。然而这种论定既不合事理，亦有违事实。因为“风起于青萍之末”，世无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依理推度，前流派词不可能不预伏“艳科”因子；而检诸事实，只须对其稍加涉猎，亦不难发现“媚”语“艳”情于其词并非绝无仅有，而系时能一见。因此，研究唐宋词之流派，宜自研究前流派词始。前流派词之研究，宜侧重探索其是否隐伏有“艳科”因子。前流派词若隐伏有“艳科”因子，还应进一步究明其具体表现及主要致因。本书其所以以“前流派词索隐”发端，基本缘由在此。本章以下即本“索隐”之旨，分从敦煌民间词、隋唐文人词着手，探求其或有之“艳科”因子。

一、敦煌民间词的逻辑指向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敦煌莫高窟封存近千年之数万卷写本书籍、经卷于无意中被发现，多抄写于写本之背或正文之下之“敦煌曲子词”（或“敦煌词”）乃重见于世。经不同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搜辑整理，至20世纪50年代，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以下简称“王集”）、任二北《敦煌曲校录》（以下简称《校录》）乃先后问世。“王集”主文，偏重文学性，故以“曲子词”为名，选辑较严，初版收词一百六十一首，再版亦不过增至一百六十四首。《校录》主声，偏重音乐性，故以“敦煌

曲”为称，搜求较宽，收曲五百四十五首，后扩而成《敦煌歌辞总编》，竟增收至一千二百余首。延至20世纪70~80年代，复有饶宗颐《敦煌曲》（以下简称“饶曲”）、林玫仪《敦煌曲子词斟证初编》（以下简称“林编”）相继问世。“饶曲”上接《校录》，收曲有减，“林编”直承“王集”，收词稍增，收录标准则无甚变异。两类集本之于词学研究，比较而言，以“王集”一类较合于用。“王集”分上、中、下三卷，初版收词一百六十一首，卷首所载《敦煌曲子词集叙录》（以下简称《叙录》）有明确交待，谓“右曲子词辑自敦煌所出残卷。凡伯希和所得十七卷，斯坦因所得十一卷，上虞罗氏藏三卷，日人桥川氏藏一卷，都三十有二卷。共录曲子词二百十二首，（内十三首残。）以相校补，除复重五十一首，定著为一百六十一首。（内七首残。）”“敦煌所出残卷”抄曲子词多不标姓名，除少数主名可考，系有名姓文人所撰，多数佚名难考，为民间士庶所为。前者“王集”卷末“附录一”附《更漏长》“金鸭香”、《菩萨蛮》“登楼遥望秦宫殿”、“飘飘且在三峰下”、《更漏长》“三十六宫秋夜永”、《菩萨蛮》“红炉暖阁佳人睡”五首，即于按语指明分别为唐温庭筠、李晔，五代后蜀欧阳炯所撰。后者主名难考，卷首《叙录》据所收作品内容分析，于其社会身份亦有所交待，曰：“今兹所获，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人调。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然其善者足以抗衡飞卿，比肩端己。”据所交待，可知“敦煌曲子词”乃多出自社会中下层，即多出自民间，如所谓“边客游子”、“忠臣义士”、“隐君子”、“少年学子”、“佛子”以及“医生”。就中之人虽不能说全无“文人”之嫌，如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杂考与臆说”一章即谓敦煌词《云谣集》中《天仙子》、《浣溪沙》、《喜秋天》等六首“多带文人氣息”，疑“出于文人”。但即令

是“文人”，亦必系失意之士，纵或遂心得意，亦必不忘贴近社会下层，视其为民间之士，并无不可。事实上《敦煌曲初探》同一章亦曾指出：“近来学者，几乎一致公认曰：出于当时之乐工、伶人、歌妓。”既系“公认”，必非无据。即如《敦煌曲初探》严考细校，最后结论亦不过是：“至于五百余曲，文字修整，格律无讹，接近《尊前》《花间》，多带文人氣息，除温庭筠等所作五辞，已具主名外，细细检查，严予抉择，亦尚有三十六首在。”“三十六首”所占比例甚微，足见敦煌词实乃多出自民间。就中纵有少数之作或系“出于文人”，或曾为文人所润色，其总体性质并无改变。“王集”所收词性质既明，而文学发展历史又曾一再昭示：凡源于民间之新文学，其先后相继之民间之作与文人之作，必既相通，又相异，纵相异，不掩其通。下面即以之为依据，通过有关内容归纳与艺术分析，看其与文人词特别与其后之花间词是否相通相异，其与“艳科”是否具有人未及见或未曾深究之关系。

先看其作品内容。“王集”中词抒情写物，不专于一。通观其作品内容，举凡报国之志、忠君之忧、乱世之慨、乐世之咏、闲适之意、隐逸之兴、征戍之苦、流离之恨、赞佛之讴、理病之诀、闺中思妇之怨、异族归汉之心，要有尽有。一如前引《叙录》所云：“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内容之丰厚，远非一般文人词可比，更非专言男女情事之花间词能及。尤其是表现边地人民包括异族士众爱唐之心、归汉之愿之内容，如《菩萨蛮》：“敦煌古往出神将，感得诸蕃遥钦仰。效节望龙庭。麟台早有名。只恨隔蕃部，情愿难申吐。早晚灭狼蕃，一齐拜圣颜。”《献忠心》：“臣远涉山水，来（暮）[慕]当今。到丹阙，御龙楼，弃毡帐与弓箭，不归边地，学唐化，礼仪向，